

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藏品图录 I

大元帆影

中国宋元船载文物特展

Sailing from the Great Yuan Dynasty
Relics Excavated from the Sian Shipwre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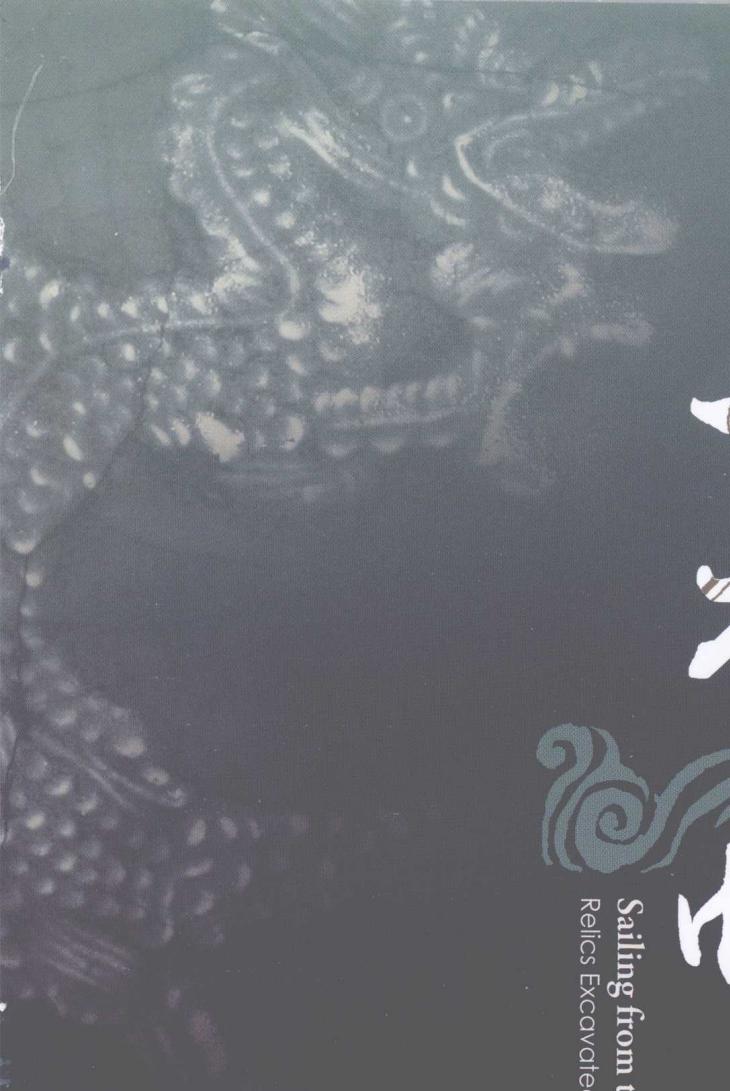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博物馆
赵燕华 编著



NLIC2970858767



文物出版社



元
帆
船

Sailing from the Great Yuan Dynasty
Relics Excavated from the Sinan Shipwreck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 / 沈琼华主编.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10-3627-1

I. ①大… II. ①沈… III. ①文物—韩国—图集
IV. ①K883.1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0005号

装帧设计 刘远

责任印制 梁秋卉

责任编辑 王霞 张小舟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制 版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盛天行健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3627-1

定 价 280.00元

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系列特展之一

大元帆影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

Sailing from the Great Yuan Dynasty
Relics Excavated from the Sinan Shipwreck



沈琼华 主编



文物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image shows a large, traditional Chinese bronze vessel, possibly a censer or a vase, with detailed lotus base and handles. It is set against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总策划：陈 浩

内容审定：许洪流

形式审定：雍泰岳

内容设计：沈琼华 陈 平 王轶凌 江 岳 杜 昊

形式设计：王 炬 周鸿远

英文翻译：袁 宏

韩文翻译：李辉达 宋东林

举办单位：浙江省博物馆 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

展览时间：2012年12月18日至2013年3月3日

展览地点：杭州西湖文化广场E区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

大元帆影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

Sailing from the Great Yuan Dynasty
Relics Excavated from the Sinan Shipwreck

目录 Contents

序一 006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 陈 浩

序二 008
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馆长 赵现钟

时空接点

——宋元时期世界贸易线上的杭州 010

浙江省博物馆 沈玲华

新安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 020

韩国国立济州博物馆 金英美

第一部分

巍巍宝船 032

第二部分

儒雅东方 052

宗教

茶酒

文艺

生活

第三部分

大战杭州 200

结束语 246

后记 247

大元帆影

序一

FOREWORD I

陈浩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
二〇一二年九月

在距今两千年前的西汉，丝绸之路已经连通了中国和西亚北非欧洲两大文明中心，东西方文明开始了频繁的交流并改变着世界的文明进程。

“海上丝绸之路”是经由海洋沟通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的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通道，也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各海路遗存中以瓷器为最多，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作“陶瓷之路”。多方的交流，不仅丰富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内涵，也促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格局。漫长的海交史为今人留下了诸多遗物、遗迹，而水下考古，仿佛让遗落在海底的颗颗明珠重现光芒，并以此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

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商贸最发达的时期之一。十三世纪，蒙古族崛起并建立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后，取《尚书》“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元统治者继承并沿袭了南宋时期海外贸易政策，步入了中外交流的极盛期。各国的使臣、传教士、商旅、游客等东西方人不绝于途，大都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都会。形成了包括东非、北非、阿拉伯半岛到波斯湾、南亚、东南亚、中国沿海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世界性的海上贸易网络。而杭州凭借澉浦、杭州、庆元、温州市舶司管理并接纳海外商船，通过大运河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内地与沿海、江南与大都的接点。

新安沉船是661年前从庆元港（宁波）出发前往日本博多港（福冈）的一艘远洋商船，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现存最大、最有价值的古代商贸船之一，它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几十年间，中、韩、日等国的考古、历史学家对它开展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有关“新安沉船”的秘密一个一个地被公布于世。今天，新安沉船文物又回到了它的起航地——浙江，透过它的前世今生，重现宋元时期繁盛的浙江以及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衷心感谢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以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出借珍藏的新安沉船文物在中国浙江省博物馆展览。

지금으로부터 2000년 전의 西漢 시대, 실크로드는 이미 중국과 서아시아, 북아프리카, 유럽의 양대 문명 중심을 연결하였으며, 동방과 서방 문명은 빈번한 교류를 시작하였고, 또한 세계의 문명 발전 과정을 변화시켰다.

“해상 실크로드”는 海洋을 경유하여 중국과 외국, 동방과 서방의 상업 무역과 문화교류의 통로였으며, 해양문화의 중요한 구성 부분이었다. 각 항로의 유물 중에 도자기가 가장 많은 까닭으로, “해상 실크로드”를 다른 이름으로 “도자의 길 (陶瓷之路)”이라고 불리었다. 다방면의 교류는 고대 중국 문화의 깊이를 풍부하게 했을 뿐만 아니라, 다른 국가 다른 민족 간의 융합을 가능하게 했으며, 다원적인 문화구성을 형성 하였다. 유구한 해양 교류 역사는 오늘날의 사람들에게 많은 유물과 유적을 남겼으며, 뿐만 아니라 수중고고는 마치 해저에서 잃어버린 날알의 아름다운 구슬 (明珠)의 빛살이 다시 나타난 것과 같고, 또한 이를 근거로 해상 실크로드의 휘황찬란한 역사를 복원 할 수 있었다.

南宋 시기는 중국 역사상 대외 무역이 가장 발달한 시기중의 하나이다. 13세기 몽고족의 궤기, 그리고 아시아와 유럽을 횡단하는 몽고 대제국의 건립 후, 『상서尚书』의 “大哉乾元”의 의미를 취하여, “大元”으로 국호를 바꾸었다. 元나라의 통치자는 남송 시기의 해외 무역 정책을 계승, 답습하였으며, 中外交流의 極盛期에 진입했다. 각 국의 사신, 선교사, 행상 그리고 여행객 등 동방, 서방의 사람들이 끊임없이 이어졌고, 元의 大都는 가장 중요한 국제적인 대도시가 되었다. 동아프리카, 북아프리카, 아라비아반도, 페르시아만, 남아시아, 동아시아, 중국 연해 그리고 한반도와 일본 열도간의 세계적인 해상 무역 네트워크가 형성되었다. 뿐만 아니라, 杭州를 기반으로 漱浦, 杭州, 慶元, 溫州市舶司에서 해외 상선을 管理, 수용하였으며, 대운하를 통해 중국과 세계, 내륙과 연해, 강남과 大都의 연결점이 되었다.

신안 침몰선은 661년 전에 慶元港 (寧波)에서 출발하여 일본 하카타항 [福岡]으로 향하는 원양 상업선으로, 목록이 발견된 현존하는 세계에서 가장 크고 가장 가치가 있는 고대 상업선 중의 하나로써, 신안선의 발견은 전세계를 깜짝 놀라게 하였다. 그 후의 몇십 년간, 한 중 일등의 국가에서 고고역사학자들이 신안선에 관련하여 깊은 조사와 연구를 전개하였으며, 그 결과로 “신안 침몰선”과 관련된 비밀이 하나하나 세상에 공개 되었다. 오늘날, 신안 해저유물은 다시 그 출항지인 절강으로 돌아왔으며, 우리로 하여금 그의 전생과 현세를 통과하여, 宋元시기 변성한 절강과 당시 중국과 한반도 그리고 일본 열도간의 상호교류와 영향관계를 재현하였다.

韓國國立光州博物館 및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韓國國立海洋文化財究所등 기관의 강력한 지원과, 진귀한 소장품인 신안 해저유물을 중국 절강성 박물관 전람하게 빌려주신 것을 진심으로 감사를 드린다.

Sailing from the Great Yuan Dynasty





序二

FOREWORD II

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馆长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赵现钟

海洋是中古时代东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很久前开始，中国以东部沿海的国际港口为据点，开拓了各种各样的航路，主导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对形成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75年，韩国全罗南道的一个渔夫从新安海底发现了青瓷花瓶，由此揭开了它真实的一面。

1976年至1984年的9年间，通过11次、共713天的发掘，发现20000余件陶瓷器、28吨铜钱、1000余根紫檀木，另外还有金属器、漆木器、石制品、骨角制品、香辛料、药材、船上生活用品、高丽青瓷，以及720余件船体残片，揭示出东亚海上交易的真实面貌。这成为韩国水下考古的最初成果，也在东亚文化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通过“庆元”铭青铜权以及“至治三年”、“东福寺”、“釣寂庵”、“笞崎宫”等纪年铭和记录寺院名称、货主名、物资种类、数量的木简，可以推定该船于1323年从浙江省庆元（宁波）出发驶向日本京都，船上运载了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白瓷和青白瓷、吉州窑白地黑花瓷、建窑黑釉盏等以陶瓷为主的各种物品。从贸易品的用途可以推知元代中国文化在镰仓时期的日本广为流行。

这些新安海底文物不仅作为14世纪东亚贸易的媒介发挥了作用，在发掘后又成为各学术研究领域国际交流的桥梁。2006年，纪念发掘30周年的国际学术大会的召开，再次提高了新安海底文物的地位和影响力。

今年正值韩中建交20周年和国立光州博物馆与浙江省博物馆友好交流5周年之际，新安海底文物在700年前的出发地浙江举办特展，作为文化交流的新里程碑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这次意义深远的展览是在韩中两国悠久友谊的基础上达成的，希望由此增进今后两馆间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及友好的文化交往。

중세 동아시아의 문물교류에 있어 주요한 통로는 바닷길입니다. 일찍이 중국은 동쪽 연안의 국제항구를 거점으로 다양한 항로를 개척하여 사회경제적 · 문화적 네트워크를 주도하였고, 동아시아 문화권 형성에 지대한 영향을 주었습니다. 이는 1975년 大韓民國 全羅南道 新安 海底에서 한 渔夫가 青瓷花瓶 등을 發見하게 되면서 眞面目이 드러나게 되었습니다.

1976년에서 1984년까지 9년 동안에 걸친 11차례 713일간의 발굴을 통해 20,000餘點의 도자기, 28톤의 동전, 1,000餘本의 紫丹木, 그 밖에 金屬器와 木漆器, 石製品과 骨角製品, 香辛料와 藥材, 船上用 生活用品, 高麗青磁, 그리고 이를 실었던 선박의 船體片 720餘點에 이르는 동아시아 해상 교역의 방대한 實相이 밝혀졌습니다. 이는 大韓民國 水中考古學의 嘴矢를 이룬 성과이자, 동아시아 문화사에 큰 足跡을 남겼습니다.

‘慶元’銘 青銅錐을 비롯하여 ‘至治三年’ · ‘東福寺’ · ‘釣寂庵’ · ‘筥崎宮’ 등의 紀年銘과 寺院 名稱, 貨物主의 이름, 물자의 종류와 수량이 기록된 木簡을 통해 日本의 京都를 목적지로 龍泉窯 青瓷, 景德鎮窯 白瓷 · 青白瓷, 吉州窯 白地黑花, 建窯 黑釉盞 등 도자기 위주의 각종 물품을 선적하여 1323년경 浙江省 慶元(寧波)에서 出凡했을 것으로 추정되었고, 교역품의 용도로 미루어 日本 鎌倉時代에 享有된 元代 中國의 文化相을 파악할 수 있게 되었습니다.

이처럼 新安 海底 遺物은 14세기 동아시아 교역의 매체로서 역할뿐만 아니라 발굴 이후 다양한 분야의 연구자들을 학술교류로 이어주는 國際架橋가 되었습니다. 지난 2006년에는 발굴 30周年 기념 국제학술대회를 통해 新安 海底 遺物의 位相과 影響 力이 다시 한번 提高 되었습니다.

今年 韓 · 中 修交 20周年과 國立光州博物館 · 浙江省博物館 交流 5周年을 맞이하여 新安 海底 遺物이 700년 전 출발했던 浙江省에서 특별전시 됨으로써 문화교류의 새 로운 里程標로 거듭나게 된 것은 매우 기쁜 일로 생각됩니다.

이 뜻 깊은 전시가 한국과 중국의 오랜 우정의 바탕하에 이루어졌듯이 향후에도 양 기관간 공고한 학술교류와 우호적인 문화교류가 증진되어 나아가길 고대합니다.

Sailing from the Great Yuan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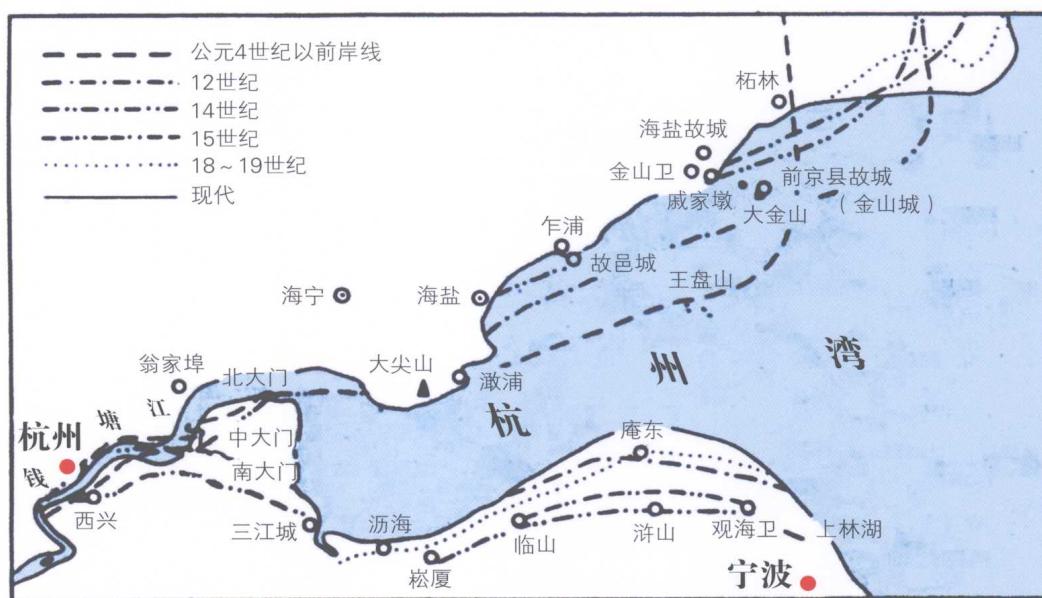


在古代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区因独特的地理环境一直相对独立，但是，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看，古代的中国并不封闭。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已通过海陆两种途径和以西亚北非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区发生了直接联系，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更加频繁，并由此改变着世界文明的进程。经由海上东来中国的西方人，最初在交州、广州与中国人开始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与中国人交往的港口也沿海岸线北上，泉州、宁波、乍浦、澉浦、厦门等地相继成为中外交通的据点，中国商人基本上也是从这些港口出海，正是凭借这些据点中国加入了海外商贸的交流体系，从而形成了旧世界体系下的世界贸易网络。本文拟立足于此大背景，略论杭州在古代世界贸易线上的地位。

南宋、元时期的杭州

南宋、元时期的杭州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史上都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赖由北宋160多年的经营，到北宋末年不仅社会、经济和文化已发展到空前的高度，而且在构成国家统治阶层的人员来源上，也彻底改变了唐代以前的世卿世禄、士族政治，科举取士和文官政治成为社会的特色，应该说这种局面为中国中世纪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的保证。

然而历史总有不幸发生，也不按人们的预期发展。女真人的入侵打破了原有的平静，宋室南渡成为这一事件的标志。宋金之间长年的战争最终形成了以淮河大散关为界的对峙局面，女真人南下入侵的势头最终被局限在北方。南北分治，宋室偏安而且不得不对金称臣、进贡¹，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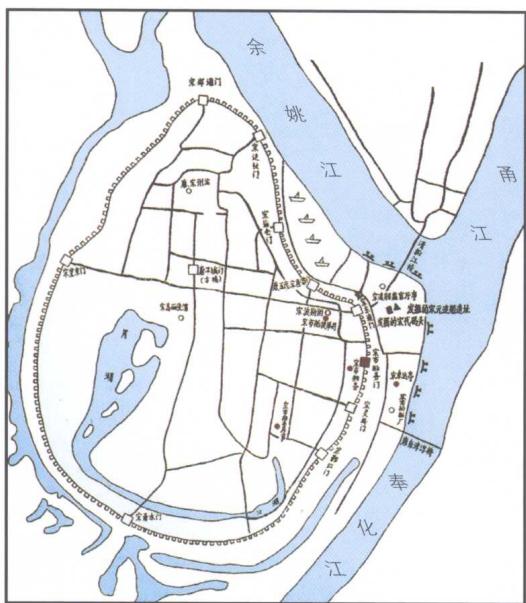


杭州湾变迁图

¹ / 绍兴议和与后来的隆兴议和的条款略有不同，但在金宋双方的协约和往来公文中，南宋皇帝只能称帝或不能称皇帝则一直不变，标志着金宋间的属从关系。

是奇耻大辱，但南宋政权的存在毕竟为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保存了半壁江山，也确保了民族的独立。五胡乱华与晋室东渡，正是在王导等人的努力下，才确保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存在，也由此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续保存了复兴的基地。陈寅恪先生称“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御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而论”，对王导的行政方法和本质用意，时人并不能理解且多有非议，但王导不为所动只是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而已²，足见其用心深远。同样面对胡人的入侵，管仲协助齐桓公励精图治、尊王攘夷，确保了华夏民族的独立与文化的传承，孔子因而赞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仅就此一点而言，南宋的立国和杭州作为南宋的帝都，在保存、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作用上，其意义非同小可。

南宋政权在中国本土虽已失去了法统与共主的地位，但在延续发展中华文明的本位上，正统性仍然得到中外的承认，简单地说只有这里才是中华。正因为如此，高丽、日本和安南诸国才继续奉南宋为中国的代表。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局面和东晋南朝时期相同。偏据东南的南朝各政权还掌握着分封朝鲜半岛和日本各国王号、册封其继承人的权力³，出土于百济武宁王陵的中国瓷器，也许正是中国南朝的皇帝赏赐给武宁王的礼品，而被武宁王作为荣耀随葬地下的，这又从考古学层面上找到了南朝代表的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有其影响的证据。后来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统治后，以朝鲜为代表的崇尚中华文化的国家，虽然在政治上不得不承认满清的宗主地位，但在文化上一直蔑视满清，并以中华文化正统传承人自居，在朝鲜除与清朝交往的官方文献行用清朝正统外，更多的则使用“崇祯后某某年”的纪年方式⁴。一方面借此表示对满清统治的抵触，另一方面则表示其对明政



明州市舶司遗址示意图(宋)

2 / 周勋初《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体论”》，《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23～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3 / 参见《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关于朝鲜、日本的各相关记述。

4 / 在朝鲜流行的这种纪年方式，多出现在各种瓷质的墓志上。

权和中华文化法统的延续⁵。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南宋时期的杭州无疑是最后保存延续古代中华文化的堡垒。

元朝是第一个由非汉族建立的全国性的政权，在历史上面对北方异族的入侵，凭借长江天堑中国文化每每得以在南方保存。元朝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使全中国第一次陷入异族的统治。经由汉族国家的文化、政治中心，到异族统治下的一个城市，杭州城市地位的变迁，也直接影响着元帝国对江南的统治。而在文化上，此时的杭州虽繁华依旧，但却是在蒙古人统治下的繁华，原来的主体民族则被法定为全国地位最低的民族——“南人”。与南方各地的城市一样，尤其是杭州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城市和首都的历史就此结束，也就此开始了南方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元代的杭州除旧有传统外，新传入的有藏传佛教、基督教和更加发展的伊斯兰教，在杭州各地出土或保存下来的蒙古文、叙利亚文石刻、碑碣，或即这一融合历史的表现。

从经济方面看，元代的杭州失去了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但作为经济中心则依旧。经唐代晚期以后的开发，到北宋时期江南已成为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转的经济基地，时谚“苏湖熟，天下足”，足见江浙的经济实力。宋室南渡并得以立国，也正是得力于这一经济基础。元代，苏湖地区同样是国家的粮仓，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端点，杭州成为确保元王朝经济来源的前方基地。故而，元代的杭州既是联系东南各地与中央的前沿阵地，也成为开启后来中国多元文化的基地之一。

中国内地交通网与海外运输线的接点

经长期的发展，唐代中国人的船队已往来于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地；同时阿拉伯人的商船也可以从其本土出发到中国广州、泉州等地，阿拉伯半岛的亚丁被称为“通往中国的门户”，交通和海道的通畅促成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交往之盛，是故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普夸口说“这里是底格里斯河，我们与中国之间没有障碍物，任何东西都可以经海路运到我们这里”⁶，巴格达成为旧世界贸易体系内西方的中心。在东方的广州和泉州已经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居住，中国皇帝和政府甚至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法官、以自己的风俗解决其内部的诉讼，也有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船队武装劫掠广州事

5 / 明朝灭亡后，朝鲜由于在文化发展程度上比满洲人先进，故而多蔑视满清，小中华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约稍晚，日本士大夫间也有了小中华的思想。

6 / [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1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件发生⁷，而在中外文献均载黄巢起义军入广州时有大量的阿拉伯人被杀⁸。广州成为和巴格达相对的、世界东方的商贸中心。

广州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络的窗口约始于秦，尤其是灵渠的开凿更使广州成为外海商贸线路与中国内地交通线的接点。到唐代中期，从广州到长安的线路一直是经西江、漓江、灵渠、湘江、长江、运河（或经汉江转陆路）、黄河、渭河抵长安；张九龄开通赣江线路后，从广州经东江、越大庾岭经赣江、入长江的线路成为东线。但是，广州一直是最主要的对外港口。

到北宋时期，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指南针的应用，航海能力也进一步提高，出海商贩者日多，中外交通的规模得以扩大，杭州、宁波、密州板桥、泉州相继成为对外交往的港口，对外商贸的港口迅速由南向北发展⁹。泉州、杭州、宁波加入对外贸易的港口，可能和五代时期国家分裂，地方政体发展外贸有关¹⁰。北宋初年以宁波、杭州和广州为市舶司，并规定中国“商人出海外蕃国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¹¹，除历史原因外，更可能与从宁波到开封距离最近可以全线航运有关。北宋晚期，在板桥置市舶司，直接原因是地近东京，能为国家库府增加收入¹²。



庆元(宁波)港位置图



庆元(宁波)港石砌码头遗址(宋)

7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

8 / [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177页引阿布·宰德《信德的阿卡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9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下》“互市舶法”条。

10 / 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政权与海外的交通详见《宋史》卷四百七十八《世家一》、卷四百九十《外国六·大食国》载南唐与占城、交趾、大食的交通，卷四百八十一《世家四》载南汉与波斯交通，卷四百八十三《世家六》载漳州陈氏航海朝贡；《辽史》载吴越钱氏贡辽；《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列传二》载南汉刘氏“广足南海珠玑”；《新五代史》卷六十八《王审知传》王氏通新罗，等等。考古发现也证明吴越产秘色瓷器在辽地多有出土，证明其与辽交往颇盛；王延钧妻吴刘华墓出土有阿拉伯釉陶器（见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期）。

11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下》“互市舶法”条。

12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下》“互市舶法”条。

从交通线路考古看，阿拉伯陶器基本出土于上述交通线的各重要据点¹³ 和对外商贸港口¹⁴，而且时间均在唐、五代。此后上述经东江、西江进入长江的线路已不再是帝国中央连接海外的主要线路。长期以来，在中外交通史上广州一城独秀的局面，渐而成为广州和杭州、宁波平分秋色。至此，就大杭州湾地区论，宁波港和杭州已分别成为该地区的海港和内河港口。从此，杭州湾和杭州开始成为中国内地交通网与海上交通相接的枢纽。而就地理位置论，单从与内地交通网的交接便利出发，杭州湾（杭州）显然要比珠江口（广州）更优越。宋室南迁与定都临安，更是杭州发展的新机遇。出于政治、经济的需求，南宋立国之初即鼓励对外贸易，甚至以赏赐金钱或官爵招徕番商，从而使得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最发达的时期之一。设在宁波的庆元市舶司成为距皇都最近的对外商贸点，再加上便利的水上交通¹⁵，以及宋代出海的中国商人必须到两浙市舶司取官券的法律，庆元港也无疑成为中外商人争趋之处。以杭州湾为媒介的庆元、杭州完成了连接中国内地交通网络与海上交通线路的进程。杭州和杭州湾成为中国与海外最重要的接点。

元朝统一后，继承了南宋王朝的对外贸易政策，甚至由官府出资制造商船出海贸易。在初定江南之时，即于至元十四年立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市舶司，终元一代，在七个市舶司中，杭州湾即有杭州、庆元、澉浦三个，其余四个分别是长江口的上海、晋江口的泉州、瓯江口的温州和珠江口的广州¹⁶。重要港口和市舶司由广州而向北发展，或可表明中国对外商业交往量的增加及交往地域上的普及。而就江海连接点看，从南到北，七个市舶司分据五个出海口，而钱塘江口一地有其三，足见当时杭州湾地区商业的繁盛，以及其与内陆交通连接的便利。



13 / 扬州博物馆《扬州古陶瓷》，文物出版社，1996年；扬州城考古队《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5期；李铧等《广西出土的波斯陶及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3年第11期。

14 / 傅亦民《唐代明州与西亚波斯地区的交往——从出土波斯陶谈起》，《海上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5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外国三·高丽》：“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山河之限甚远，今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

16 /《元史》卷九十四《食货二》“市舶”条。

17 /《元史》卷九十四《食货二》“市舶”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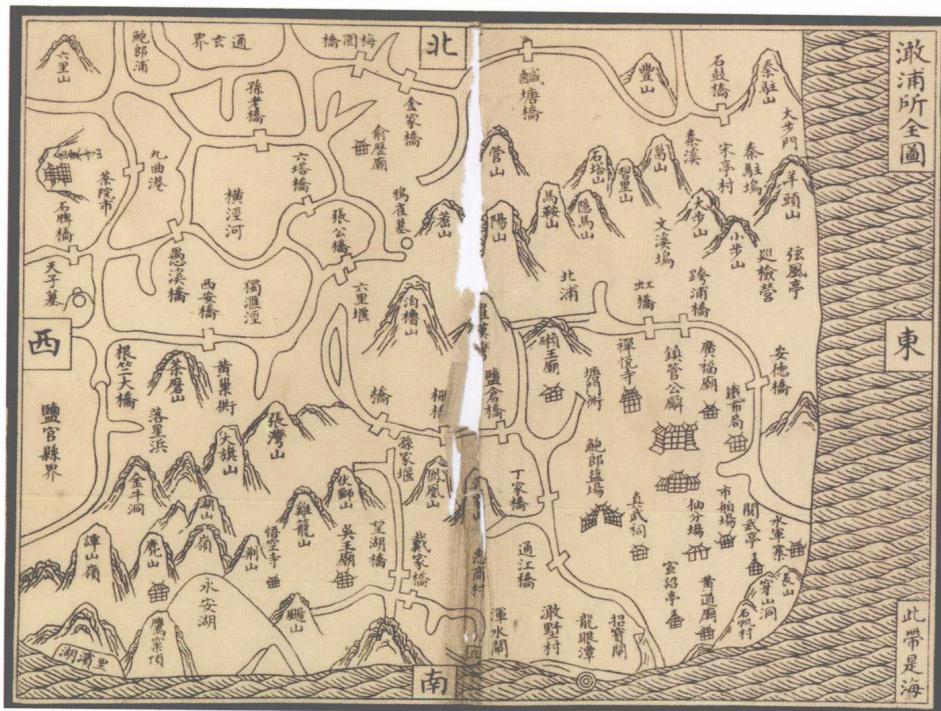
至元二十一年“立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之人得其三”¹⁷，至是，杭州除了有市舶司外，还成为元代政府官方对外贸易的基地之一，这是杭州在元代保持了国际性都市的制度保证。

在杭州湾沿岸，除了设市舶司的澉浦、杭州、庆元外，其他一些港口也是当时对外交流的重要地，从考古发现看杭州湾北岸的乍浦即是元代龙泉窑瓷器的主要集散地之一，由于有乍浦出土的龙泉窑瓷器作为标准，在陶瓷研究中对龙泉窑瓷器进行分类时一直有“乍浦龙泉”的称法。

杭州湾凭借澉浦、杭州、庆元市舶司管理并接纳海外商船，进而通过大运河成为连接内地与沿海、江南与当时最重要的国际都会大都的接点。宁波、澉浦作为大杭州的一员，和杭州湾的其他城市港口一样，如众星拱月般地促成了杭州的繁荣。

世界贸易线上的杭州

南宋、元代，由于中外商业交通的发展，以及中国政府政策的刺激，形成了包括东非、北非、阿拉伯半岛到波斯湾、南亚、东南亚、中国沿海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世界性的海上贸易网络。来往于东西方的商船不断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北非各地航行，甚者可远达欧洲。宋元时期中外贸易的盛况与交流的商品内容，古人的记述较详，今人也多有研究。此时中国的杭州、宁波、温州、泉州、广州等沿海地区是这个贸易网上最主要的港口与目的地，杭州一直是东方世界的经济中心。



《常棠澉水志》澉浦城图（宋）

南宋时期的杭州与杭州湾，作为对外的港口和帝国的都城，无疑是国内与国际贸易最繁华的地区和东方世界的国际性大都会。中国内地的商品从各地向杭州汇集，并从这里被运往各国，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经由不同的途径被送到这里¹⁸，同样从这里向中国内地辐射。对外，宁波（明州）作为东通高丽、日本的商贸港口，是中国连接东亚各地的据点；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商船和商品也同样在杭州湾汇集后，再向东亚的高丽、日本周转。杭州湾成为内地与沿海、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

元代的杭州是元朝政府官方对外商贸基地之一，也是外商云集之地。来自中国内地的商品也从这里出海走向世界，域外方物宝货也以此地为中转站行销内地。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他在杭州湾的澉浦既看到有往来印度及其他外国的商船¹⁹，也在杭州市内看到有印度商人的货栈²⁰，以及在城内生活的基督教徒、回教徒、祆教徒等，据其记载这里虽只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之礼拜堂一所”，但回教徒则多达四万户²¹。在杭州城既有来自外国的葡萄与葡萄酒，也每天消费产自南洋的胡椒四十四担，每担合二百二十三磅²²。外国人的这些记载说明，元代的杭州和杭州湾仍是大元帝国通往海外、接纳世界的



左上 \ 杭州天方先贤卜合提亚尔墓园（南宋）

右上 \ 杭州凤凰寺（元）

左下 \ 杭州慧因高丽寺（宋、元）